

【儒家道家经典全释】



春秋穀梁传

● 邓 泓 贾文启 注译

1998 · 大连

导　　言

《春秋》，又称《春秋经》，据说为孔子所作，因而历来被视为儒家的重要典籍之一。实际上，《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从鲁国的角度，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史实。《春秋》的特点是微而显，志而晦，文字十分简略，一般人很难弄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于是在经文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专门解释经义的“传”。“经”和“传”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衣之表里一样。桓谭在《新论》中说：“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据史料记载，《春秋》共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五种传文，《邹氏传》、《夹氏传》都没有传下来，剩下的《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就是人们习称的《春秋三传》。

《穀梁传》的作者，据说是受经于孔子弟子子夏的谷梁赤。唐代学者杨士勋在为《穀梁传》所作的《疏》中，是这样说的：“穀梁子，名赤，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

但《穀梁传》的写定，是西汉以后的事情，而穀梁赤是战国秦孝公时人。杨士勋的这个说法显然是有误的。徐彦的《公羊传疏》谈到《公羊传》的得名时说：“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穀梁传》也应当是这种情况。因此，《穀梁传》并非穀梁赤所自作，而是他在汉代的后学根据战国“口说流行”写定的，因为这一学派的祖师是穀梁赤，所以题名为《穀梁传》。至于写定年代，史书明确记载《公羊传》写于西汉景帝时，《穀梁传》则史无明文。后世学者有的认为《穀梁》先于《公羊》，有的则认为后于《公羊》。由于资料的缺乏，《穀梁》、《公羊》孰先孰后已经不好判定了，总而言之是时间相差不大的。由于《穀梁》、《公羊》都

是写于汉代，用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所以称为“今文经”，而《左传》写于战国初年，是用古代文字写成的，所以称为“古文经”。

西汉是今文经盛行的时候，《穀梁》、《公羊》都立于学官，有专门的博士讲授。但二者之间，却颇有此消彼长之势。景帝、武帝时期公羊学盛行，董仲舒、公孙弘等人都是治公羊学的。与董仲舒同时的穀梁学经师是瑕丘人江公，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而“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加上丞相公孙弘也治《公羊》，由是公羊学大兴，武帝并诏命太子受公羊学。然而昭宣之后，穀梁学盛行起来，并逐渐有了压倒《公羊》的趋势。《汉书·儒林传》说，昭帝时鲁人荣广“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宣帝即位后，听说卫太子好《穀梁》，便向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史高等询问《公羊》、《穀梁》的高低优劣。这些人是鲁人，都说《穀梁》本鲁学，《公羊》为齐学，鲁学优于齐学，故而宜兴《穀梁》，于是《穀梁》开始受到重视，《穀梁》学者也开始得到重用。到了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宣帝又“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穀梁》、《公羊》学者各五人，双方辩论的结果，是《穀梁》压倒了《公羊》，于是“《穀梁》之学大盛”。参加这次辩论的穀梁学者丁姓后来官至中山太傅，他的弟子申章昌官至长沙太傅，并培养了一大批穀梁学者。另一位参加辩论的穀梁学者尹更始官至谏大夫、长乐户将，弟子较为著名的有翟方进、房凤和尹咸等。尹咸后来官至大司农，翟方进官至丞相。加上另一位《穀梁》传人胡常，到西汉新莽年间穀梁学分化出了尹、胡、申章、房氏四家之学。但此时《左传》的地位日益重要，《穀梁》学者，便多治《左传》以补《穀梁》之不足，西汉末年《左传》立于学官，《穀梁》的地位也便为之取代了。

穀梁学在西汉的兴衰，表面上是学术的演变，其实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西汉前期，尤其是文、景、武帝时期，诸侯势力的发展与割据化倾向的加剧是西汉中央政权面临的首要政治问题，宣扬“《春秋》大一统”、宣扬法治精神的公羊学，正好适应了统治者巩固

中央集权、稳定政局的政治需要，于是公羊学大为兴盛。而穀梁学不能满足这一点，自然也就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与扶持。昭帝、宣帝时期，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诸侯割据势力已经基本被消除，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停止，国力的恢复，和平环境的到来，将“稽古礼文”的礼制、礼治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视礼义教化、重视宗法情谊的穀梁学逐渐受到了重视，而强调法治、强调大义灭亲的公羊学则逐渐受到冷落。到了新莽年间，王莽为了达到改制篡位之目的，又极力扶持《左传》、《周礼》等“古文经”，穀梁的地位，于是便为《左传》所取代。

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看，《左传》、《公羊》、《穀梁》这《春秋三传》，其实是互有短长、互相补充的，前人对此已多有认识，诸如“《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左氏》拘于赴告，《公羊》牵于讐纬，《穀梁》窘于日月”，“《左氏》失之流，《公羊》失之险，《穀梁》失之迂”，“《左氏》之失，专而纵；《公羊》之失，杂而拘；《穀梁》不纵不拘，而失之随”，“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或失之诬，或失之乱，或失之凿”，等等。这些评论，大多是很精当的。需要指出的，《春秋》毕竟本是一部史学著作，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历史价值。《左传》后来之所以成为《三传》之中的翘楚，从根本上讲与其着重陈述历史事实的风格有很大关系，而《公羊》、《穀梁》两家是将《春秋》视为“经”的，因而所着力的是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固然可以应一时之需，但一旦事过境迁，人们也就往往弃之若敝履了，况且史实不明，何来微言大义？这是《公羊》、《穀梁》的致命伤，也是《公羊》、《穀梁》二传被《左传》压倒的根本原因。难怪乎《北史·儒林传》竟有这样的评价：“其《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惜怀。”因而到了隋唐时期，就已经有很多人弄不明白《公羊》、《穀梁》究竟要说些什么了。而二者之中，尤以《穀梁》的命运最惨。《公羊》毕竟还有一个清代的短暂复兴，而《穀梁传》自东汉之后，几乎成了绝响，再也无法“经世致用”了。但是，《穀梁传》毕竟是一部较早的典籍，而且是一部曾经很有影响的典籍。在它的身上，同样折

射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今天,《穀梁传》的政治价值虽然已经丧失了,但它的文化价值却是任何其他典籍所取代不了的。它凝聚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那群特定的知识分子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思考与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重读这部典籍,也是有其特定的意义的。

这次注译,依据的底本是清刻《十三经注疏》本。在注译过程中参考了清人钟文烝的《穀梁补注》、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等成果,謹此致谢。《穀梁》自古号称难读,加上我们水平所限,舛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注译者

1998年5月

目 录

導言	(1)
隱公		
元年	(1)
二年	(4)
三年	(6)
四年	(8)
五年	(9)
六年	(11)
七年	(12)
八年	(13)
九年	(15)
十年	(16)
十一年	(18)
桓公		
元年	(19)
二年	(21)
三年	(23)
四年	(25)
五年	(25)
六年	(27)
七年	(28)
八年	(29)
九年	(30)
十年	(31)
十一年	(32)

十二年	(33)
十三年	(34)
十四年	(35)
十五年	(36)
十六年	(38)
十七年	(38)
十八年	(39)
庄公		
元年	(41)
二年	(43)
三年	(44)
四年	(46)
五年	(47)
六年	(48)
七年	(49)
八年	(50)
九年	(51)
十年	(53)
十一年	(55)
十二年	(55)
十三年	(56)
十四年	(57)
十五年	(58)
十六年	(59)
十七年	(59)
十八年	(60)
十九年	(61)
二十年	(62)
二十一年	(63)
二十二年	(64)

二十三年	(65)
二十四年	(67)
二十五年	(69)
二十六年	(70)
二十七年	(70)
二十八年	(72)
二十九年	(74)
三十年	(75)
三十一年	(76)
三十二年	(77)
閔公	
元年	(79)
二年	(80)
僖公	
元年	(82)
二年	(84)
三年	(87)
四年	(88)
五年	(90)
六年	(93)
七年	(93)
八年	(94)
九年	(96)
十年	(97)
十一年	(99)
十二年	(100)
十三年	(101)
十四年	(101)
十五年	(102)
十六年	(104)

十七年	(105)
十八年	(107)
十九年	(108)
二十年	(109)
二十一年	(110)
二十二年	(111)
二十三年	(113)
二十四年	(114)
二十五年	(115)
二十六年	(116)
二十七年	(118)
二十八年	(118)
二十九年	(122)
三十年	(122)
三十一年	(124)
三十二年	(125)
三十三年	(125)

文公

元年	(128)
二年	(129)
三年	(131)
四年	(132)
五年	(133)
六年	(134)
七年	(136)
八年	(137)
九年	(138)
十年	(140)
十一年	(141)
十二年	(142)

十三年	(143)
十四年	(144)
十五年	(146)
十六年	(147)
十七年	(148)
十八年	(149)

宣公

元年	(151)
二年	(153)
三年	(154)
四年	(155)
五年	(156)
六年	(157)
七年	(157)
八年	(158)
九年	(160)
十年	(161)
十一年	(162)
十二年	(163)
十三年	(164)
十四年	(164)
十五年	(165)
十六年	(167)
十七年	(167)
十八年	(168)

成公

元年	(171)
二年	(173)
三年	(175)
四年	(176)

五年	(177)
六年	(178)
七年	(179)
八年	(181)
九年	(182)
十年	(184)
十一年	(184)
十二年	(185)
十三年	(186)
十四年	(187)
十五年	(188)
十六年	(189)
十七年	(191)
十八年	(193)

襄公

元年	(195)
二年	(196)
三年	(197)
四年	(198)
五年	(198)
六年	(200)
七年	(200)
八年	(202)
九年	(203)
十年	(204)
十一年	(205)
十二年	(207)
十三年	(208)
十四年	(208)
十五年	(209)

十六年	(210)
十七年	(211)
十八年	(211)
十九年	(212)
二十年	(214)
二十一年	(215)
二十二年	(216)
二十三年	(216)
二十四年	(218)
二十五年	(219)
二十六年	(220)
二十七年	(221)
二十八年	(222)
二十九年	(223)
三十年	(225)
三十一年	(227)
昭公		
元年	(228)
二年	(229)
三年	(230)
四年	(230)
五年	(232)
六年	(233)
七年	(234)
八年	(235)
九年	(237)
十年	(237)
十一年	(238)
十二年	(239)
十三年	(240)

十四年	(242)
十五年	(243)
十六年	(243)
十七年	(244)
十八年	(245)
十九年	(246)
二十年	(247)
二十一年	(248)
二十二年	(249)
二十三年	(250)
二十四年	(252)
二十五年	(252)
二十六年	(254)
二十七年	(255)
二十八年	(256)
二十九年	(256)
三十年	(257)
三十一年	(258)
三十二年	(259)
定公		
元年	(260)
二年	(263)
三年	(264)
四年	(264)
五年	(267)
六年	(268)
七年	(268)
八年	(269)
九年	(270)
十年	(271)

十一年	(273)
十二年	(274)
十三年	(275)
十四年	(276)
十五年	(277)
哀公		
元年	(279)
二年	(281)
三年	(282)
四年	(283)
五年	(284)
六年	(285)
七年	(286)
八年	(287)
九年	(287)
十年	(288)
十一年	(289)
十二年	(289)
十三年	(290)
十四年	(291)

隱公

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①。

虽无事，必举正月^②，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③？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④，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⑤。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己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⑥，蹈道则未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昧^⑦。

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⑧。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

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鄙”，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而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①。

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礼：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君子以其可辞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赗者何也？乘马曰赗，衣衾曰襚^②，贝玉曰含，钱财曰赙^③。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名不日^④。“宿”，邑名也。

冬，十月二月，祭伯来。

“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聘弓矰矢不出竟场，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公子益师卒。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

【注释】

①王正月：隐公初年，周王正月。②举：言称的意思。③焉：哪里。④弑：杀害君主。⑤信：通“伸”。⑥千乘之国：大国的意思。⑦邾：鲁国的附属国，在今山东邹城境内。眗：地名，在今山东泗水东。⑧郿：地名，在今河南郿陵北。⑨赗（fèng）：助葬的车马。⑩襚（suì）：赠送死人的衣衾。⑪赙（fù）：以财物助人办丧事。⑫日：用作动词，记……日子。

【译文】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

虽然没有事情可记，也一定要从正月说起。这是为了郑重地记载国君开始为君。为什么不说隐公即位？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在哪一点上成全他的心意？是说他无意为君。他无意为君是怎么一回事？是要把君位让给桓公。让给桓公是正当的吗？不正当。《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公所为不合礼制却成全他是为什么？是要用这种方式贬斥桓公。《春秋》如何贬斥桓公呢？隐公将让位而桓公却杀死他，那么桓公之恶就不难看出来了。桓公杀隐公而隐

公要让位，那么隐公之善也就不难看出来了。既然好却说他不合礼制是为什么？《春秋》崇尚礼义。而不崇尚私惠，伸张正义而不助长邪气。孝子发扬父亲美好的德行，不张扬父亲的过恶。先君想把君位传给桓公，不是正，而是邪。尽管如此，先君最终克服了自己的邪心，将君位传给了隐公。隐公自己却顺承先君的邪心把君位让给桓公，就是成全父亲的过恶。兄先弟后，是天的伦常。隐公作为儿子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君位；作为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了公的爵命。自己却废弃天伦，不顾君父之命而施以私惠，是不正当的。像隐公这样的人，可说是以泱泱大国的君位为轻，却不懂得什么是道义。

三月，隐公与邾父在昧结盟。

所谓“及”是什么意思？是鲁国想与邾结盟。“仪”是邾君的字，“父”如同“傅”，是男子的美称。这里不称“邾子”是因为？邾在上古是个卑微的小国，没有受到周的爵命。没有记日子，是因为那盟约改变了。昧，是地名。

夏季，五月，郑伯在郿地打败了共叔段。

“克”是什么意思？是能的意思。能什么？能杀。为什么不不说杀？是表示段有军队。段是郑伯的弟弟，如何知道他是郑伯的弟弟？杀世子、同母弟，指明国君，因为指明了国君，所以知道他是弟弟。段是弟却不说他是弟，是公子却不说他是公子，是贬斥他。段是有失为子弟之道的，贬斥段，表明郑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说郑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郑伯处心积虑要杀死弟弟。“在郿地”，表明遥远。如同说从他母亲怀中夺过来杀了他，是强调他的恶行。那么，作为郑伯应该怎么办？缓慢地追赶，让贼人逃去，这是亲爱亲人的办法。

秋季，七月，天王派宰咺来给惠公仲子赠送助葬的车马。

母亲以儿子为氏，仲子是什么人？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礼制：给人母亲赠助葬品是可以的，给人的妾赠助葬品是不可以的。君子认为鲁国可以接受这些助葬品。《春秋》记这件事，是因为没有及时赠送。赠是什么？车马助葬称赗，衣被助葬称襚，贝壳玉石助葬称含，钱财助葬称赙。

九月，与宋人在宿盟誓。

“及”是什么意思？表示我国地位不高的人参加盟会。“宋人”，表明宋国参加盟会的人地位也不高。地位不高的人结盟，不记日